

鲁迅全集（第五卷）

伪自由书

本书收作者 1933 年 1 月至 5 月间所作杂文四十三篇，1933 年 10 月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作者设计封面，在“伪自由书”下手书“一名《不三不四集》”。次年 2 月被当局查禁。作者生前只印行一版次。1936 年 11 月曾由上海联华书局以《不三不四集》书名印行一版。

前 记

这一本小书里的，是从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为止的寄给《申报》^[1]上的《自由谈》的杂感。

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谈》，《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大约是去年的年底罢，偶然遇见郁达夫^[2]先生，他告诉我说，《自由谈》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3]先生了，但他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我就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

对于达夫先生的嘱咐，我是常常“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说罢，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4]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的攻击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创造”脸。虽然他们之中，后来有的化为隐士，有的化为富翁，有的化为实践的革命者，有的也化为奸细，而在“创造”这一面大纛之下的时候，却总是神气十足，好像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对于文学的意见，我们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然而所谈的大抵是空话。但这样的就熟识了，我有时要求他写一篇文章，

他一定如约寄来，则他希望我做一点东西，我当然应该漫应曰可以。但应而至于“漫”，我已经懒散得多了。

但从此我就看看《自由谈》，不过仍然没有投稿。不久，听到了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几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谈》里看见一篇文章^[5]，其中说的是每日使婴儿看看遗照，给他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笔，想做一篇反对的文章，因为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但是也没有竟做，改为给《自由谈》的投稿了，这就是这本书里的第一篇《崇实》^[6]；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何家干”，有时也用“干”或“丁萌”。

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

的。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论文章的是非，而先问作者是那一个；也就是别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击了。自然，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侠客。总之，这种战术，是陈源^[7]教授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开其端，事隔十年，大家早经忘却了，这回是王平陵^[8]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9]先生揭露于后，都是做着关于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则牵连而至于左翼文学者。此外为我所看见的还有好几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后，以见上海有些所谓文学家的笔战，是怎样的东西，和我的短评本身，有什么关系。但另有几篇，是因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并存以便读者的参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这禁止的是官方检查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呢，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现在便将那些都归在这一本里，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是为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于上海寓庐，鲁迅记。

*

*

*

[1] 《申报》 旧中国出版时间最久的日报。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商在上海创办，1909年为买办席裕福所收买，1912年转让给史量才，次年由史接办。九一八事变以后，曾反映民众抗日要求。1934年11月史量才遭国民党暗杀后，该报重趋

保守。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时停刊。《自由谈》是该报副刊之一，始办于1911年8月24日，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1932年12月起，一度革新内容，常刊载进步作家写的杂文、短评。

〔2〕 郁达夫(1896—1945) 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1928年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等。

〔3〕 黎烈文(1904—1972) 湖南湘潭人，翻译家。1932年12月起任《申报·自由谈》编辑，1934年5月去职。

〔4〕 创造社 文学社团，1921年6月成立于日本东京，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主要活动在上海。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1927年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日本回来的新成员。1928年，该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1929年2月，该社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社丛书》、《社会科学丛书》等。

〔5〕 指黎烈文的《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是一篇缅怀亡妻的文章，载于1933年1月25日《自由谈》，后收入他的散文集《崇高的母性》。

〔6〕 作者第一篇刊于《自由谈》上的文章，是《“逃”的合理化》，收入本书时改题《逃的辩护》。

〔7〕 陈源(1896—1970) 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作家。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曾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鲁迅即教

育部佥事周树人”，是陈源在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说的话。

〔8〕 王平陵(1898—1964) 江苏溧阳人，曾任《时事新报》、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主编，提倡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这里说的“告发”，见本书《不通两种》附录《“最通的”文艺》。

〔9〕 周木斋(1910—1941) 江苏武进人，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和写作。这里说的“揭露”，见本书《文人无文》附录《第四种人》。

一九三三年

观 斗^{〔1〕}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赢。古时候有斗鱼，现在变把戏的会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东方杂志》^{〔2〕}，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不过和西班牙却两样的，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

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

军阀们只管自己斗争着，人民不与闻，只是看。

然而军阀们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是使兵士们相斗争，所以频年恶战，而头儿个个终于是好好的，忽而误会消释了，忽而杯酒言欢了，忽而共同御侮了，忽而立誓报国了，忽而……。不消说，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来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们玩把戏，只是看。

但我们的斗士，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3〕}云。

“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负弩前驱”呢，

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

还是留着国产的兵士和现买的军火，自己斗争下去罢。中国的人口多得很，暂时总有一些子遗在看着的。但自然，倘要这样，则对于外敌，就一定非“爱和平”^{〔4〕}不可。

一月二十四日。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1月31日上海《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 《东方杂志》 综合性刊物，1904年3月在上海创刊，1948年12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1月16日该刊第三十卷第二号，曾刊载浙江婺州（今金华）斗牛照片数帧，题为《中国之斗牛》。

〔3〕 负弩前驱 语出《逸周书》：“武王伐纣，散宜生、闳夭负弩前驱。”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每当日军进攻，中国驻守军队大多奉命后退，如1933年1月3日日军进攻山海关时，当地驻军在四小时后即放弃要塞，不战而退。而远离前线的大小军阀却常故作姿态，扬言“抗日”，如山海关沦陷后，在四川参加军阀混战和“剿匪”反共的田颂尧于1月20日发通电说：“准备为国效命，候中央明令，即负弩前驱。”

〔4〕 爱和平 当时国民党当局经常以“爱和平”这类论调掩盖其不抵抗政策，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9月22日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讲时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逃的辩护

[1]

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现在这晦气落在学生头上了,进也挨骂,退也挨骂。

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2〕

验尸之后,报告书上说道,“身上五色”。我实在不懂。

谁发一句质问,谁提一句抗议呢?有些人还笑骂他们。

还要开除,还要告诉家长,还要劝进研究室。一年以来,好了,总算安静了。但不料榆关〔3〕失了守,上海还远,北平却不行了,因为连研究室也有了危险。住在上海的人们想必记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研究室里还坐得住么?〔4〕

北平的大学生是知道的,并且有记性,这回不再用头来“碰”刺刀和枪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却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这正是这几年来的教育显了成效。

然而又有人来骂了〔5〕。童子军〔6〕还在烈士们的挽联上,

说他们“遗臭万年”〔7〕。

但我们想一想罢：不是连语言历史研究所〔8〕里的没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么？不是学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备的飞机么？能用本国的刺刀和枪柄“碰”得瘟头瘟脑，躲进研究室里去的，倒能并不瘟头瘟脑，不被外国的飞机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么？

阿弥陀佛！

一月二十四日。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1月30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逃”的合理化》，署名何家干。

〔2〕 指学生到南京请愿一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学生奋起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2月初，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于12月5日通令全国，加以禁止；17日出动军警，逮捕和屠杀在南京请愿示威的各地学生，有的学生遭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事后国民党当局为掩盖真相，诬称学生“为反动分子所利用”、被害学生是“失足落水”等，并发表验尸报告，说被害者“腿有青紫白黑四色，上身为黑白二色”。

〔3〕 榆关 即山海关，1933年1月3日为日军攻陷。

〔4〕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处于战区的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等，校舍或毁于炮火，或被日军夺占，学生流散。

〔5〕 山海关失守后，北平形势危急，各大、中学学生有请求展缓考期、提前放假或请假离校的事。当时曾有自称“血魂除奸团”者，为

此责骂学生“贪生怕死”、“无耻而懦弱”。周木斋在《涛声》第二卷第四期(1933年1月21日)发表的《骂人与自骂》一文中,也说学生是“敌人未到,闻风远逸”,“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

〔6〕 童子军 1908年英国最早创设的一种使少年儿童接受军事化训练并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组织。不久流行于许多国家。中国的童子军于1912年成立,首创于武昌文华书院,后发展到各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组建为全国性组织,定名为“中国童子军”,其总部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7〕 遗臭万年 1933年1月22日,国民党当局为掩饰其自动放弃山海关等长城要隘的罪行,在北平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会上有国民党操纵的童子军组织送的挽联,上写:“将士饮弹杀敌,烈于千古;学生罢考潜逃,臭及万年。”

〔8〕 语言历史研究所 应作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的一个机构,当时设在北平。许多珍贵的古代文物归它保管。该所于1933年1月21日将首批古物三十箱、古书九十箱运至南京。

崇 实^[1]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

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2]和不准大学生逃难^[3]，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4]，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5]《黄鹤楼》诗以吊之，曰——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6]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一月三十一日。

※

※

※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2月6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 北平的迁移古物 1933年1月3日日本侵占山海关后，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于1月17日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收藏的古物分批从北平运至南京、上海。

〔3〕 不准大学生逃难 1933年1月28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各大学：“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诿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

〔4〕 禹是一条虫 这是顾颉刚在1923年讨论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他在对禹作考证时，曾以《说文解字》训“禹”为“虫”作根据，提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的推断。（见《古史辨》第一册第六十三页）

〔5〕 崔颢（？—754） 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唐代诗人。他的《黄鹤楼》诗原文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6〕 文化城 1932年10月初，北平文教界江瀚、刘复等三十多人，在日军进逼关内，华北危急时，向国民党政府呈送意见书，以北

平保存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文化品物”和“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为由,建议“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北平的军事设备挪开”,用不设防来求得北平免遭日军炮火。该意见书曾刊载于10月6日《世界日报》。